

现代来华阿拉伯语教师的历史贡献*

马保全

摘要：阿拉伯语是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之一，也是“一带一路”沿线二十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官方语言。据初步统计，现有史可考的该时期来华外教共八人，因该段历史乏人研究，本文按其所来国家自北往南整理，对其中来自同一国家者，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并试总结其在“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阿拉伯语 “一带一路” 近代来华外国教师

“一带一路”沿线有二十多个阿拉伯国家使用阿拉伯语，20世纪初以来已有多批阿拉伯语教师来华执教，本文梳理这方面的阿拉伯语文献，总结阿拉伯语教师对中阿交流做出的历史贡献。

一、四位土耳其学者来华任阿拉伯语外教

（一）土耳其阿里·雷抓、哈夫足·哈三与达玺尔三人在北京教授阿拉伯语

1907年，受当时奥斯曼帝国哈里发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②的委派，两位土耳其学者阿里·雷抓（علي رضا‘aliyriḍā）与哈夫足·哈三（حافظ حسن hāfiẓ ḥasan），来到中国了解中国社会情况，并在北京宣武区牛街一带居住。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近代学者海外出版阿拉伯文译著搜集、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7CTQ019。

② 奥斯曼帝国哈里发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1842—1918），于1876年至1909年在位。

1908年1月（光绪三十三年腊月中旬），曾经访问奥斯曼土耳其的王宽成立了“京都牛街清真西寺公立两等小学堂”（一般简称为“清真两等小学堂”），在该学堂成立时，留下了一帧珍贵的照片^①。其中就有这两位于110年前来到中国并从事了阿拉伯语教学工作的土耳其学者。这两位学者中，一位自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毕业，另一位教育背景不详。当时的英文资料记载：“牛街礼拜寺是一座大寺……在该寺中居住着一位土耳其先生，他是爱资哈尔大学的学者之一，他从事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的教学。”^②

当时曾受教于这两位土耳其学者的孙绳武先生，记录了这两位学者教学的情况：“阿立雷咱和哈桑哈飞足两大‘艾番底’（先生），先王氏来华讲学……王阿衡……与教中各先进协力创办回教改良大学于牛街大寺。请阿立雷咱担任阿拉伯文化高级讲座教授，哈桑哈飞足担任初级讲座教授。……我亦初级学生，为哈氏及门弟子。各地负笈来学者极多，一时称盛。……新的阿拉伯语文，至是始能了解和运用，而对于阿文杂志报章的阅读，也是从是时起。宣统末年，阿、哈两氏回国，……达玺尔来华继任。”^③

因史料的缺乏，我们仅能了解到这两位土耳其学者曾经在牛街地区居住，并教授过阿拉伯语。具体而言，一位负责“阿拉伯文化高级讲座”，一位负责“初级讲座”。二人于宣统末年（约1911—1912年间）回国。这两位土耳其学者来华，成功从事了阿拉伯语相关教学，“新的阿拉伯语文，至是始能了解和运用，而对于阿文杂志报章的阅读，也是从是时起”^④。二人的到来，可称近现代阿拉伯语外教来华的开端，为中国传统的阿拉伯语教学带来了新的内容，开设了之前没有的

① 自北京市宣武区伊斯兰教协会编：《清真古韵 北京牛街礼拜寺》，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② Marshall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 a Neglected Problem* (London: Morgan and Scott, 1910), p.243.

③ 孙绳武：《三十年来的中阿文化关系》，《回民言论半月刊》，1939年第一卷第3期。

④ 同上。

口语、阿拉伯文报纸、杂志阅览等课程，着手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阅读运用、理解能力。

同据孙绳武的记载，可知土耳其方面另派达玺尔先生来华任教阿拉伯语，关于此人的情况，暂缺资料。其名或为 طاهر tāhir。

（二）成达师范学校聘请土耳其人阿布顿拉为外教

1933年4月，经唐柯三先生介绍，成达师范学校从西北中学聘请了土耳其籍的阿布顿拉（عبدالله ‘abdullah）前来从事阿拉伯语相关教学工作。周仲仁先生当时以笔名“仁”撰写了《欢迎阿布顿拉先生》一文，文中记载“阿布顿拉先生……是沟通世界文化的效命者”同时还具有反殖民主义高尚情操，他是“抱着抗敌决心的志士，到中国来对于沟通中西文化，对于抗敌战线，具有很大的意义”。^①翻检史料，可知这位阿拉伯语外教是土耳其人^②，于1933年4月开始在成达师范“到校上课”^③，大概工作时间半年^④。具体教学情况及是否编写教材等，均未见史料记载，需留待进一步研究。

二、三位埃及学者来华任阿拉伯语外教

（一）埃及国王福德派遣达理与福力腓乐两位外教前来成达师范学校从事阿拉伯语教学工作

1932年8月，马松亭阿訇等因送成达师范毕业生留学埃及，晋谒埃及国王福德一世，他对中阿文化的友好交往很有兴趣，决定捐赠图

① 参见《本校大事记》，《成师校刊》，1936年第三卷第5期。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1933年8月，埃及国王所派的达理与福力腓乐抵达北京，开始在成达师范教学。之后各类资料中，均未见有关阿布顿拉的记载，由此来看，约在8月前后，这位阿布顿拉就因故离开了成达师范。

书一批，并派员来北平成达师范学校任教^①。所派两位外教均为埃及人，系爱资哈尔大学教师，一为达理全名筛海·赛义德·穆罕默德·达理（الشيخ السيد محمد الدالي\alshaykhalsayyidmuhammadaldāliy）、一为福力腓乐全名筛海·穆罕默德·伊伯拉欣·福力腓乐（الشيخ محمد ابراهيم فليفل\alshaykhmuhammadibrāhīm fulayfil）。民国史料中留下了欢迎此二位埃及专家的报章记载：这两位外教自海路从上海登陆后，从上海经济南到北京，受到热烈欢迎。其中北京的欢迎仪式最为热烈，“到会者约三四千人”，仪式中的欢迎词说：

达理、福力腓乐两大博士……埃及之大文学家，不惜重大牺牲，远涉重洋，奉国王之命，毅然决然来中国成达学校，担任此一区区教授，……其志愿之宏达，我们又是不是应该十二万分的钦佩与感谢呢？^②

《月华》、《成师校刊》等民国期报刊中有不少这两位外教的演讲、游记和记事。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刘麟瑞教授在其回忆录中专辟一节，以“埃及教师”为题，介绍这两位埃及外教“均身穿肥大的对襟长袍，头戴红色毡帽，外裹缠头布，看去颇有气派。……这是爱大教师……的服饰。”他们与中国同学建立了良好师生关系，同时记载：“福莱斐勒老师用的是他自编的一本简明语法教材。”并说：“福莱斐勒老师……为满足教学需要，他还编写过几种教材……两位老师教学上都有一套办法，而且都很耐心。”^③至于这位埃及外教专门为中国学

① 此事有多处史料记载，为行文方便，仅选一条以说明。1935年《成师校刊》第二卷第2期记载：“埃及政府特派赛依德穆罕默德达理及穆罕默德卜拉欣福力腓乐二筛海来华担任本校回文教授……以资沟通中西文化。”保全按：此处的“回文”，系指阿拉伯文。

② 《中山公园欢迎会主席团代表致辞 欢迎达理、福力腓乐两博士开会词》，《月华》，1933年第五卷第25期。

③ 刘慧：《刘麟瑞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55—56页。福莱斐勒即福力腓乐，系对同一人名的不同翻译。

生编写的教材其内容如何,刘麟瑞教授并未详谈。

近期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作者意外见到了福力腓乐先生在成达师范工作时所编辑出版的语法教材一册。该教材长25厘米,宽17.5厘米,厚约0.4厘米,共113页(含序言页码),纸张为民国时期书籍常用的铅印纸。阿拉伯文铅字印刷,全部内容为阿拉伯文,无汉语亦无明确出版日期。封面印有该书书名《阿拉伯语学生简明语法》(القواعد الجلية لطلاب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alqawā'id aljaliyyah liṭulāballughat al'arabiyyah),

另印有其他基本信息:第一部分;编者:谢赫:穆罕默德·伊伯拉欣·福力腓乐——爱资哈尔大学博士、北平成达师范学校教师;北平成达师范印刷部印刷。

该教材是阿拉伯语外教在中国编著并以阿拉伯文活字刊印的第一册针对中国学生的教科书。序言中说^①:

埃及国王福德一世……派我们来到中国……从事……阿拉伯文的教学,理解阿拉伯语……是建立在了解阿拉伯文语法的基础之上的,于是我立即编写了包含初学者所需要内容的教材。该语法教材多含例子与练习,这足以专门用来掌握理解阿拉伯语语法,并在学生的头脑中形成扎实记忆。我为成达师范学校的同学们编辑此书……编辑此书时,我避免了困难与复杂之处,所以……此书简单明了,其中毫无含混。我的确希望每一位读者、学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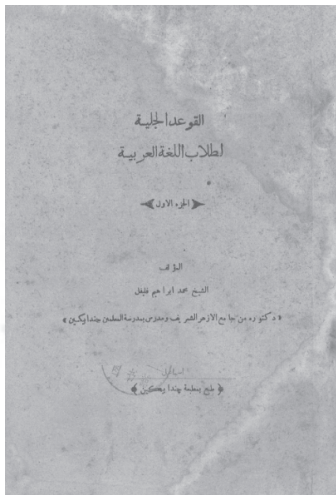


图1 《阿拉伯语学生简明语法》书籍封面

^① 本文所引该书内容均由作者译为汉语。

教授者因此书而获益。

这本教材体现了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世界当时简明阿拉伯语语法著作的特点，并成功实现了与中国学生的对接，书中的例句包括经训和近代著作中的典型例句，可谓举一反三，令学生通过例句加深对语法现象的记忆，同时进一步熟悉了阿拉伯国家的风土人情等。限于篇幅，此处仅举书中一例：

三母动词的词根

三母动词词根形式很多，需通过听他人讲解或检索语法书籍才能尽知。尽管如此，仍有大多数词根有规律可循，主要如下：

1. 三母动词表示职业，其词根为فعالة形式。比如：我铸造了这一耳环。(صغت القرط صياغة) 我染了这身衣服。(الثوب صباغة صيغت)

2. 如果表示拒绝反对，则其词根形式أفعالا形式。比如：这位纺织工人非常厌恶。(نفارا نفر الغزال) 这匹马任性难驭。(الفرس جماحا جمع)

3. 如果表示被迫、窘迫的情况，则其词根为أفعلن形式。比如：心砰砰跳。(خفق القلب خفقاناً) 河水满了。(فاض النهر فيضاناً) 鸟都飞走了。(طار العصفور طيراناً)

4. 如果表示行走，其词根为أفعلال形式。比如：人群散了。(وخذ البعير وخيلاً) 骆驼加速之后，大步奔跑。(رحل القوم رحيلاً)

5. 如果表示一种声音，则其词根为أفعلال或أفعلا形式。比如：马鸣叫了。(صار الفرس صهيلاً) 狮子吼叫了。(زار الأسد زئيراً)

6. 如果表示一种颜色，词根为أفعله形式。比如：庄稼变绿了。(حضر الزرع حضرة) 花变红了。(حمر الورد حمرة)

7. 如果表示一种疾病，词根为أفعلا形式。比如：病人咳嗽。(زكم زكاماً) 他感冒了。(سعل المريض سعالاً)

若未表示上述含义，动词为فَعَلَ形式的时候，词根经常为فعلة或فعالة的形式。比如：事情变得简单了。(سهل الأمر سهولة) 再比如：这个青年人口才好。(فصح الغلام فصاحة)。

在فعل形式的动词中，当العين为齐齿符时，其词根为فَعَلًا。例如：他很高兴。(فرح فرحا) 他口渴了。(عطش عطشاً)。

在فعل形式的动词中，当العين为开口符时，其词根为فعولا。例如：他坐在了某处。(قعد قعدوا) 他坐下了。(جلس جلوساً)。

在及物的情况下，动词فَعِلَ和فَعِلَ的词根是فَعَّلًا。例如：他理解了。(فهم فهماً) 他打开了。(فتحاً فتح)。

其他与上述语法所不同的阿语词根，则是根据实际听到的情况而定。比如：他知道了。(علم علماً) 他致谢了。(شكر شكراً) 他走了。(ذهب ذهاباً) 他很吝啬。(بخل بخلاً) 他判决了。(حكم حكماً) 他变好了。(حسن حسناً) ①

这两位外教在中国期间，不但在阿拉伯语教学工作中成效显著，而且与成达师范的同事和同学们都有着良好的关系。成达师范第一班毕业生周仲仁先生回忆：“还有两名埃及教师，他们是赛义德·穆罕默德·达理和穆罕默德·伊卜拉欣·福力菲勒，他们到北平需要有人为其做翻译。仲仁先生随同回北平就是为他们到北平……当译员。”②1937年4月，成达师范“法鲁克中国留埃学生团定期招考”消息中，达理与福莱斐勒被聘请为考试委员③。可见当时这两位外教还在中国。卢沟桥事变之后，成达师范自北平迁移桂林。在这之前，二人返回埃及。

“回教近东访问团”访问埃及期间，曾专门拜访他们：“达理与以

① [埃及]福力菲勒：《阿拉伯语学生简明语法》(阿拉伯文版)，北平成达师范印刷部印刷，出版年末注明，第11—13页。

② 周仲仁口述、周宏康整理：《周仲仁年谱》，内部资料，2006年，第6页。

③ 《成师校刊》，1937年第四卷第3—5期合刊。

卜拉欣二筛海归国后，任爱资哈尔中学校教员，彼等颇怀想中国，尤其是中国热诚之友。二君往访，彼欢迎以极，出其美茶糖果以饗客。达理有二女，长者已十二三岁，幼者亦五六岁，长者修美，宛然大女郎，尚能说中国话，幼者则仍埃及小儿矣。世明谓：‘彼等初归国时，幼者见其亲族皆恐惧。哭思中国之家。抚慰而不能止。余殊可怜之近已如常。甚矣！风土之移人也。’”^①紧接着又访问了福力腓乐先生：“三月十五日，达理来，乃偕往访以卜拉欣筛海^②，所住地甚偏僻。以卜拉欣犹如昨日风度，而面色较红润。彼尚能谈少许中国话，程度较强于达理也。飧余等以中国茶，极道中国社会之好，使彼等留恋不已。”^③

达理与福力腓乐两位埃及外教来华是专职而来。他们在中国期间，与师生也有着良好的交往。回国后，中国朋友仍不忘其教学贡献，在赴埃及时专程探望。这成为中阿友好关系的鲜活例证。

（二）埃及外教康美伦先生来到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任教

康美伦，全名穆罕默德·康美伦·雅古特·米苏里（ياقوت المصري محمد كامل muḥammadkāmilyāqūtalmiṣriyy），又译为穆罕默德·卡米莱，1934年到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任教。1935年1月1日出版的《伊斯兰学生杂志》第四期曾记载他来到了中国，专门从事阿拉伯语教学工作，原文如下：

本校添聘埃及人教授

埃人穆罕默德卡米莱……为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毕业得学士学位，近应本校之聘，已于十月十五日来沪……二十五日入校，今已上课矣。先生对于教授，借用埃及新进之教授方法，今后想定有相当之发展云。

① 薛文波：《雪岭重译》，民间刊印本，2004年，第119页。

② 此处是对筛海·穆罕默德·伊伯拉欣·福力腓乐全名不同内容的选用，也指福力腓乐。

③ 薛文波：《雪岭重译》，第119页。

作者搜集到康美伦与黄承才先生编辑，达浦生、哈德成、买俊三校订的《模范中阿会话》^①一书，该书中阿两种语言对照，于1936年10月出版于位于上海西门内西仓桥华兴里四三号的中国回教书局。全书438页，应为石印或木板雕刻印刷，非阿拉伯文铅字、活字。所见版本为扫描后再次复印版，长28厘米，宽20厘米，原书长宽不详。黄承才先生在该书中文序言中论述道：“读外国语者，须具有四种要素：（一）能读（二）能说（三）能作（四）能写……阿文传至中国虽有悠久之历史，但无相当之改革。故至今仍是抱残守缺，毫无进步。埃及康美伦先生（Mohammad Kamel）阿文文学士也，精通阿、法、英三国语言。而对于阿文，尤具专长。民国二十三年秋，就教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担任阿文会话、读本、作文三科教授，授课以来，学生皆有长足之进步。惟先生之至中国，乃游历性质，不能久住，而我国内地读者，仍无习学会话之机会……合编一部阿文会话书。”^②

依据序言中的这一段话，我们不难看出康美伦先生在中国期间，从事了阿拉伯语会话、读本、作文三科的教授工作，并根据教学经验和学生缺乏学习会话机会的特点，就会话领域与黄承才先生一并编辑出了该书——这一外教教学的成果。在本书阿拉伯文的序言中，康美伦与黄承才先生共同制定了本书学习的八个步骤，兹分别翻译如下：

第一，整段阅读对话，并了解其大意。

第二，熟练记忆困难的单词，特别是对话、语段中出现的单词。

第三，将自己视为对话中的一方，并隐藏另一方的对答，自己尝试回答，然后根据书中内容去检查，以确定自己理解的能力和对整段的记忆，然后直接以阿语进行练习。

① 该书的校订者达浦生、哈德成、买俊三，都是近代闻人，生平介绍资料丰富，兹不赘述。另外一名编辑者黄承才，是买俊三先生的女婿，1949年后曾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专业任讲师等职，现已去世多年。本人曾设法搜寻有关黄承才先生的生平资料，但尚未找到，盼知情者不吝赐知。

② 康美伦、黄承才编：《模范中阿会话》，上海：中国回教书局，1936年，第1页。

第四，大声朗读每一段，以便于让舌头适合阿语发音，同样练习耳朵以适合听取阿语，如果只是以眼睛去读，则学生不会获益。

第五，若语段中有注释，则学习之。

第六，学生应利用各种机会，在同学之间互相使用刚学的、刚记下的句型与生词以阿语交流，以便于熟练掌握阿拉伯语听说。

第七，在学校中，教师讲完对话后，应要求两名学生，每人扮演对话中的一方来阅读。在下一节课中，请这两位同学在不看教材的情况下，以所学对话中的句型进行对话。

第八，学习者在完成上述步骤之后，尤益就所学对话的主题，写一篇作文，并在写作中使用该对话课中所出现的句型。这会提高学习者阿拉伯文写作的能力。^①

全书有四编，第一编为“字汇”，包括基数、序数、小数、分数、百分率、星期日、月份名、四季名、时间、天文、地理、国家、政体、政法机关、官职，以及蔬菜、水果、疾病等等。大概相当于现在阿拉伯语学习者常见的分类词汇表或小词典。第二编为“问句作法”，包括多少、什么、为什么、用什么、由什么、关于谁、哪里、何时等等。这大概等于今天阿拉伯语常见疑问句式表达汇总。第三编为“一问多答”包括这是什么、你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东西、你有什么东西、你做什么、你立意做什么、你要什么、你还要什么、他里面有什么等等，都是一问一答的形式。第四编为“对谈法”，包括与新生谈话、困难的功课、教员与学生、复数、作文与默书、阿文练习、学习阿文、阿文会话、学校与教育、分科、教育之种类、请假与退席、请假外出、暑假、布置家庭等等内容。涵盖了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种种问题以及回答。

通读此书，作者发现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本专门以阿拉伯文

^① 康美伦、黄承才编：《模范中阿会话》，第4—5页。

对话或会话为主题的著作。更早的一本是清代宣统二年（1910年），四川周子宾先生编著的《阿拉伯语言撮要》一书^①。从行文风格上看，黄承才与康美伦的这一著作，更为符合近当代阿拉伯国家的口语习惯，以标准语解释了阿拉伯国家日常生活中的各类对话与回答的标准句式。同时本书的编写，从“字汇”，也就是单词开始，然后进入简单的问句，试着由单词组成最为简单的疑问句，进而学习一问多答和对谈，掌握各种疑问句的回答和谈话方法，让读者有迹可循，逐步掌握。

在《模范中阿会话》的阿拉伯文序言中，康美伦先生写明：因埃及的事务，他不得不返回埃及，故在1936年，这位埃及外教离开中国他就。

三、一位南亚学者来华任阿拉伯语外教

1934年8月1日，上海伊斯兰师范金子常主编的《伊斯兰学生杂志》第一卷第三期《添聘外人教授》一文中，曾记载了这位叫作法都里衣俩希（**فضل الله** faḍlillah）的印度人在该校任教，原文如下：“印人法都里衣俩希先生，埃及文科大学毕业。前曾任上海英领事府要职。博学多能，精通数国文字，如：英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务勒都、般札布、印度等。本学期，应本校之请已来校上课，教授阿文作文、会话课程。法氏……尤擅教授会话，想本学期之阿文作文、会话定有相当之进展矣。”

除这则新闻之外，尚未见到其他关于这位外教的史料。《伊斯兰学生杂志》这一刊物属不定期期刊，其第一卷第二期出版于1931年，故而这位法都里衣俩希应于1933年前后在上海任教。

^① 周子宾先生这一著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葛铁鹰教授首先发现并提示作者，后作者辗转获得此书图片，特此向葛教授致谢。

结 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更为重视阿拉伯语专业，也有更多的阿拉伯语外教来到中国从事相关教学工作，其中佼佼者，如曾在北京大学工作多年并编著有多种教材的奥贝德（اسلامه عبيد salāmat‘ubayd）先生（1921—1984）等。迄今全国已有50多所高校设有阿拉伯语专业，绝大多数院校出于专业建设、提高学生业务水平等考虑，均聘请有阿拉伯语外教——这已大大超越了前文所论述的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数量。梳理近现代阿拉伯语外教来华的历史及其相关情况，不难发现他们的确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首先在课程内容方面，丰富了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内涵。中等学校阶段，是阿拉伯语教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阿拉伯语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先声。近代以来，各地中等学校开始培养阿拉伯语相关人才，其中以成达师范学校、上海伊斯兰师范、云南明德中学最为著名。这些人才中的佼佼者，在留学埃及学成归国后，成为了中国各大高校阿拉伯语及相关专业的创始人。近现代来华阿拉伯语外教是各中等学校阿拉伯语教学工作中的重要成员，他们所讲授的口语等课程，是一般中国教师所无法胜任的。随着他们的到来，上述课程得以开设起来，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课程数量与内涵变得更加丰富。

其二在语言方面，在实质上提升了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水准。阿拉伯语在中国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外教的到来，给中国的阿拉伯语学习者带来了新的活力。学习口语，离不开阿拉伯语母语人士的教学以及专门口语书籍的编写。近现代来华的阿拉伯语外教，重视口语教学，让学生具备了基本口语的听说能力。埃及外教康美伦与黄承才合编的《模范中阿会话》一书，为我们保留下了当时外教进行阿拉伯语口语教学的教材。阿拉伯语外教开设的其他相关课程的、《阿拉伯语学生简明语法》之类教材的编写，使得学生学到更为简明的阿拉伯语

语法知识，并可实践于阅读、翻译近代阿拉伯语的著作、报纸、新闻等，开拓了学生视野，丰富了其知识类型。

其三，在交流方面，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民间的友好交往。他们的到来，本身就是中国与土耳其、埃及等国友好交往不断深化的表现，其他诸如国人去埃及时还专行拜访等等事例，则是中阿友谊之树常青的真实例证。在更宽泛的层面而言，语言是不同国家交往的基本工具，近现代外教讲授阿拉伯语、学生学习阿拉伯语，促进了中阿文化交流，沟通了中阿人民的感情。是“一带一路”沿线民心相通、互联互通的一个成功历史经验。